

艺术乡建国际比较视域下的中国乡村叙事话语构建

李 敢

摘 要: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叙事话语构建成为推动乡村社会全面发展的一条重要路径。艺术乡建作为推进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模式之一,通过丰富乡村文化供给、促进文旅融合以及增强文化软实力,可以为乡村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从国际比较视域出发,分析不同国家艺术乡建的实践路径及其情境适应性,能够揭示艺术介入对乡村身份重塑和可持续发展的具体作用机制。国际比较视角下的艺术乡建研究,不仅有利于深化对艺术赋能乡村振兴的理论认知,还能够为中国乡村发展的政策优化和实践创新提供有益借鉴。现阶段,中国艺术乡建实践在全球语境中的独特性与共性,为乡村振兴叙事话语的理论拓展提供了新的分析维度。中国艺术乡建不仅通过文化表达丰富着乡村内涵,更在构建现代、宜居且具有精神活力的乡村社区方面展现出独特价值。这一积极探索对于完善中国乡村振兴理论体系和指导乡村建设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乡村振兴;艺术乡建;国际比较;乡村叙事话语

中图分类号: D422.6; J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5)05-0075-09

一、研究背景和问题提出

自2017年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来,促进乡村文化振兴成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之一。乡村文化振兴不仅关乎乡村社会的物质文明建设,更关乎乡村精神文明和文化软实力的重塑与发展。在这一重要政策背景下,作为文化赋能乡村发展的一条重要路径,艺术乡建^①逐渐成为推动乡村多维振兴的创新实践,并逐渐发展为当代乡村建设领域的一个重要议题。

广义而言,艺术乡建指艺术介入乡村建设,通过引入艺术元素,激活乡村文化活力,推动乡村空间创新与社区参与,进而促进乡村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作为乡村文化与现代艺术结合的产物,艺术乡建从物质空间和文化场景的层面重新塑造乡村,对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尽管艺

术乡建作为专业术语出现的时间较晚,但其理念的产生早有渊源。近代的“莫干山乡村改进”等乡村改良运动^[1],即已初现以文化艺术促进乡村发展的积极尝试。近年来,国际上以日本新潟县的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韩国的“韩屋再造”等为代表的艺术乡建案例,展现了艺术在乡村振兴中的独特价值与多样模式。

国内艺术乡建的实践探索,伴随着乡村政策体系的演变而逐步展开。关于艺术乡建起源的界定,学界虽有不同观点,但普遍认同其与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中国城乡关系重构的时代发展要求和国家顶层设计密切相关^[2-4]。特别是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着重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标志着中国乡村建设政策重心的重大转向。之后,伴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的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的废止以及2008年浙江省安吉市“中国美丽乡村计划”的启动等一系

收稿日期:2025-02-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虚-实空间交互视角下城市社区韧性的变化机理与提升路径研究”(23BGL285)。

作者简介:李敢,男,社会学博士,南京邮电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江苏南京 210003)。

列新举措的落地实施,艺术介入乡村的社会发展探索开始获得越来越多的政策支持和社会帮助。近年来,从“美丽乡村”到“和美乡村”的概念迭代,进一步突显出乡村文化振兴和审美重构的重要性,为艺术乡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

在此背景下,艺术乡建不仅承担着乡村物质空间美化的重要功能,更逐渐成为重塑乡村叙事话语、彰显乡村主体性的关键手段。通过艺术实践赋能乡村文化生产与社区认同,推动乡村由现代化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叙事者,正成为新时代乡村振兴叙事的重要趋势。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孤立个案分析或实践总结,缺乏系统的国际比较与理论提炼。因此,本文拟以国际比较的视角,梳理欧、日、韩等国家和地区在艺术乡建领域的实践模式,分析它们对乡村叙事话语建构的启示,进而结合中国国情和具体实际,探讨以艺术乡建为载体有效重构中国乡村叙事体系的作用机制,以期提升乡村文化自信与文化软实力提供可能路径。在乡村振兴战略纵深推进的时代语境下,本研究旨在为推动新时代中国乡村社会全面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二、艺术乡建兴起背景、内涵及国际实践模式比较

1. 艺术乡建的兴起背景

近年来,全球乡村地区普遍面临人口外流、经济活力衰退、地方文化传统断裂等多重挑战。在此背景下,艺术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介入手段,逐渐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展现出不可替代的作用。国际学术界广泛认为,艺术、文化与遗产不仅能显著提升乡村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质量,还正在成为重塑乡村社会角色与经济功能的重要动力来源^[5]。例如,英国通过创意产业政策激活乡村传统的物理空间和潜在的文化空间,赋能当地经济发展;加拿大将文化艺术活动融入乡村日常生活,促进乡村社区凝聚力的提升;荷兰则在传统农业地区推行文化复兴项目,促进农业、文化、旅游的深度融合^[6-7]。

在中国,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通过艺术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艺术乡建也被作为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抓手,开始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例如,一些地方通过引入艺术创作、文化节庆活动和文旅融合项目,尝试在保护地方文化脉络的基础上,激发乡村内生发展动力,重塑乡村社会与文化结构^[8-9]。这一现象表明,艺术乡建的兴起并不仅仅

是对乡村经济复苏的直接回应,更深层次地体现着现代社会对乡村文化生态修复、乡村社会认同重建以及乡土价值体系重塑的强烈诉求。

综合国际与国内的相关经验,可以看出,艺术乡建正在成为全球范围内乡村转型叙事中的重要路径。其背后不仅体现着政策推动与市场需求的相互作用,更展现了全球化背景下地方文化复兴的发展趋势。未来,艺术乡建有望在乡村社会创新、地方文化再生产、城乡融合以及经济可持续发展中持续发挥重要作用。

2. 艺术乡建的基本概念

关于艺术乡建的概念界定,学界至今尚未形成统一共识。部分研究者将艺术乡建视为一种艺术介入乡村空间与生活实践的过程,强调艺术与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维系统的互动关系^[10-11]。他们认为,艺术不仅改变了乡村的空间景观,更深刻地影响了乡村社会结构和居民身份认同。另一部分学者则从文化认同与价值重塑的角度切入,指出艺术乡建不仅是对物理空间的重塑,更是对文化意义、社会关系与精神生活的再造^[12]。

在理论演进过程中,艺术乡建被进一步理解为全球艺术社会化转向在中国乡村语境下的特殊体现,是对中国百年乡村建设思想传统的继承与创新^[13]。这一观点认为,艺术乡建不仅承载着外来艺术实验的初衷,更通过与地方性知识、乡土经验的深度结合,发展成为一种复合型、本土化的乡村建设模式。其核心在于突破单向度的文化输入模式,转向以地方主体为中心、以文化自主性为导向的内生型发展路径。

由此可见,艺术乡建的理论基础已由最初的外来文化实验逐步深化为具有本土认知、自组织特征和社会实践维度的乡村重建实践。相关研究为当代中国乡村叙事话语的建构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与方法论支撑。

3. 艺术乡建的国际实践模式比较

艺术乡建作为一种在特有空间场景里带有内容导向的建设模式,既是一种艺术生产方式,也是一种社会建设。从国际视角看,不同国家根据各自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形成了多样化的艺术乡建实践模式,展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与理论创新。

在日本,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等项目,以艺术与农耕生活的共生理念为核心,强调村民与艺术家的深度合作。项目通过艺术装置、表演艺术与乡村劳作场景的有机结合,建构了以“共感美学”为主旨的

乡村叙事体系,成功实现了乡村空间与文化活力的双重复兴^[14]。

在欧洲,荷兰与意大利等国家则采取了以艺术村庄建设和艺术节活动为主要形式的模式。通过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的融合,激发乡村旅游的潜力,同时带动文化产业发展。例如,意大利的阿尔贝罗贝洛艺术节以保护地方建筑遗产和促进社区主体性参与为双重目标,探索出艺术、旅游与地方治理融合发展的综合性路径^[15]。

在北美地区,加拿大的艺术乡建更倾向于小规模、社区导向的文化项目。通过遗产保护、公共艺术计划和社区艺术活动,强化社会包容性与多元文化认同,促进乡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16]。如加拿大壁画小镇倩美纳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本是一个以林业为主导、经济萧条的小镇,通过引入壁画创意产业,成为世界知名的壁画小镇,带动当地综合产业发展。为保证壁画的艺术价值,小镇不仅邀请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免费提供食宿,让他们倾注全力在小镇的墙壁上绘制壁画(这些壁画大都涂写在小镇的各式建筑上),而且针对壁画的创作设置了一套严格的程序,即壁画协会负责听取公众和社区居民的想法,业主也会提出壁画创作的创意;协会根据收集到的照片、历史资料和创意进行整理,并选择合适的位置,然后向艺术家提出创作提案;艺术家对提案做出回应后,交由专业的指导委员会讨论,最后提交协会的董事会决定。取材于本地历史文化元素的壁画创作一直在持续,使这座小镇不仅成为一座壁画艺术的世界,更是一个活态的历史博物馆。世界各地的艺术爱好者被吸引至此,流连忘返;小镇的居民也能从一幅幅壁画中感受小镇的历史,并从中传承精神的力量,增进对家乡的认同和情感。

不同国家的艺术乡建实践表明,艺术乡建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艺术生产方式能否基于地方文化特质,建立有效的社区叙事机制,激发本地居民的文化自信与参与热情。对于中国而言,如何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同时,坚持本土创新,是推动艺术乡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命题。

4. 国际实践模式对中国的有益启示

承前,艺术乡建在全球的扩散,为中国实施类似建设项目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借鉴国际经验,特别是日本、欧洲和北美等地的经验,可以为中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实践借鉴和话语构建启示。

国际经验突出了乡土艺术活动中传统与现代的战略性融合^[17]。欧洲的案例往往强调遗产保护和

以社区为基础的艺术干预,致力于将传统工艺与当代文化表达相结合。例如,欧洲文化之都项目倡议通过投资艺术项目和基础设施,将乡村城镇变成文化中心。同样,日本的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则展示了艺术如何通过反映当地历史和景观的特定价值以缓解农村地区人口减少和经济衰退的问题。这些案例说明,要创造出既扎根又创新的乡村复兴叙事话语,其重点在于要在乡村艺术生产和社会建设中真正实现地方性文化主体身份与现代艺术实践的紧密结合。

对于中国来说,国际艺术乡建的不同案例为重新思考艺术在中国乡村环境中的多维功能作用提供了实践参考。换言之,不能将艺术乡建仅仅视为一种乡村美化或旅游推广的方式方法,而应将其视为一个赋予乡村社区主体权力行动并借以传承和发展地方特色文化的参与性过程。在实践中,这意味着乡村艺术项目的治理模式须从自上而下转向自下而上。此外,亦须高度重视跨学科合作的重要性,即要善于通过各种创新举措,积极推动艺术家、建筑师、社会学家和以社区居民为代表的当地利益相关者共同创造乡村空间及其象征意义。

通过对国外艺术乡建项目的观察分析,可以发现,乡村艺术项目有助于重新定义乡村,乡村不再只是作为一个落后或匮乏的空间被大众关注,相反,乡村以其区别于城市的独特空间和文化,逐渐成为富于文化创造力、弹性和包容性的创意前沿而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随着党和政府致力于彻底解决城乡差距问题的发展战略推进,这种重新定义乡村价值的发展理念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具有显著的时代价值。在全球范例的指导下,一个清晰的话语路线可以推进国内艺术乡建更上一层楼,使其成为国家发展战略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此外,国际经验也强调了为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量身定制艺术干预的必要性,对于中国乡村建设避免同质化叙事提供了有益借鉴。中国乡村地区的多样性要求建构本土化的乡村话语体系和话语模式,使其能够与本土价值观和日常生活经验产生共鸣。全球学习与本地适应之间的辩证关系有助于帮助我们使中国乡村发展的话语叙事既能够与国际社会相对接,又能够保持自己的文化基础和文化风韵。

综上所述,国际上的艺术乡建模式对中国类似项目的落地实施及其叙事塑造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通过激励社区参与,实施可持续发展以及汲取全球实践中保持文化真实性的经验教训,中国可以

建立一种细致入微的乡村话语赋权体系,将乡村重新塑造为不止于溯往的遗迹,更是充满创新与跨界、赋能与共生、凝聚与融合的文化沃土和艺术家园。

三、中国艺术乡建的实践演进与现实反思

1. 实践发展与演进趋势

艺术乡建作为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路径,其在中国的兴起与扩展经历了从“文化介入”到“系统协同”的阶段性转变^[18]。早期艺术家以个人方式进驻乡村,多以艺术创作为主要目的,带有显著的实验性和审美导向。随着国家层面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化实施,艺术乡建逐渐被纳入公共政策视野,成为整合多元资源、提升乡村文化价值与生态韧性的实践形式。

在政策引导与社会参与的双重驱动下,中国艺术乡建呈现出由点及面的扩散态势。从空间美学改造走向制度协同治理,从个体表达转向社区集体协作,其功能已超越艺术本体,逐渐转化为涵养乡村社会资本、重构地方认同、培育文化产业生态的复合型实践。

2. 浙江经验的系统探索及其实践特征

浙江省是艺术乡建在中国的重要实践前沿^②,其实践探索具有高度系统性和政策牵引性。基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通过文化嵌入与机制创新,浙江省积极推动在地资源活化与乡村文化主体性复兴,形成了现代艺术形式与地方特色文化深度融合的发展路径。

以浙北德清县为例,当地将艺术力量视为推动乡村空间更新与文化复兴的重要抓手。政府牵头积极引进策展机构与艺术家团队,并联合当地村委会与乡贤群体等村民自治组织,形成“政府引导+专业支持+村民参与”的三方联动机制。艺术乡建实践不再局限于“展览式”的短期行为,而是深入村落的公共生活场景,通过定期展览、手工艺复兴、村史记、空间叙事等形式,实现文化记忆的重塑与社区认同的重建。

在浙西衢州市和浙南丽水市,美丽乡村建设与艺术乡建相互嵌合,强调生态理念与艺术语言的协同表达。例如,依托生态博物馆和自然教育平台开展的艺术活动,不仅提升了村落文化品牌,也带动了相关产业链的发展,实现了文化效应与经济效应的双向转化。

浙江经验的突出特点在于其政策驱动的结构保障和制度设计能力。一方面,地方政府高度重视艺术在乡村治理中的潜能,提供资金、制度、平台等多重支持;另一方面,在项目执行中强调以“在地性”为核心的协作机制,确保外来艺术资源能够与本土文化系统形成有机衔接。

3. 反思与挑战

艺术乡建虽然在一些地方取得了积极进展,但从全国范围看,其整体发展仍面临若干突出问题,尤其是在项目主体结构、价值实现机制与文化表达逻辑方面存在一定的制度性张力和现实矛盾^[19-21]。

首先,实践中存在的“村民边缘化”问题。一些艺术乡建项目在设计与实施中仍由外来艺术家或专业团队主导,村民参与局限于“配合”与“展示”环节,缺乏实质性的话语权与决策权。这种自上而下的建构模式削弱了乡村文化的内生动力,导致项目结束后难以保持“在地化”的持续运作。

其次,“城市视角主导”的文化输出倾向明显。在部分案例中,艺术表达更注重外部传播与视觉呈现,过度迎合城市观众与消费市场的审美趣味,忽略了与乡村文化语境的深度契合。这种文化“空投”行为不仅无法实现乡村文化主体性的真正唤醒,反而加剧了城乡之间的话语权失衡以及乡建同质化。

再次,“短期行为”与“项目依赖”并存的困境。许多艺术项目依赖政府短期资金投入与媒体曝光支持,缺乏内生性驱动机制,难以形成可持续的社区协同与文化再生产模式。此外,一些地方还出现了“打卡景观化”倾向,使艺术乡建陷入“形式重于内涵”的浅层恶性循环。

最后,在跨界协同机制方面艺术与乡村发展的深度融合仍有障碍。当前艺术乡建涉及文化、教育、旅游、农业、交通等多个领域,但跨界协同体尚未稳定成型,艺术家、策展人、市场、社会力量与基层治理组织之间仍存在沟通壁垒,制约整体效能的发挥。

概言之,中国艺术乡建的发展已逐步迈入政策支持与社会实践双轨驱动的新阶段。浙江模式为中国乡村文化复兴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展示了艺术与政策、空间、生活协同作用的可能路径。然而,从全国范围看,艺术乡建的长效机制尚未完全建立,文化表达、社区协作与制度保障之间仍需更加紧密的协同与调整。未来的艺术乡建应以村民主体性与文化在地性为核心,探索可持续的社会协作与文化再生产机制,为新时代乡村叙事话语的多元建构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

四、新时期中国乡村叙事话语的学理抽象与理论演绎

1. 问题意识的生成:从艺术实践到乡村叙事的理论关切

近年来,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引领下,中国艺术乡建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不同于以往自上而下的政策实施逻辑,当下的艺术乡建不仅由地方政府积极推动,更吸引了大量艺术家、设计师、社会组织等多元行动者的广泛参与。由此,艺术乡建逐渐摆脱“孤岛式”个案实验的局限,开始向系统化、网络化、多元协同的方向演进。这一转变不仅体现在实践规模的扩展,更在于其内在问题意识的深化,尤其是对“乡村如何被讲述”这一叙事话语建构问题的高度关注。

文化自觉作为乡村文化振兴的内生动力,意味着乡村社会成员能够主动认识、珍视并创造性转化自身文化传统。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理论指出,文化认同不是对传统的简单复归,而是在全球化条件下对本土文化的理性理解与能动选择^[22-23]。新时代,这一理念与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关于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明互鉴的主张形成了高度契合^[24]。

随着艺术介入乡村的广泛展开,乡村叙事不再是农民个体的自发讲述,也不仅仅只是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一部分,而是逐渐成为多元主体共同协商、重构认同的复杂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关于乡村叙事的主体、内容、方式与接受机制等核心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并构成艺术乡建理论建构的起点。具体而言,这些问题可归结为三重关切:其一,“谁来讲述乡村”的问题。其不仅涉及叙事主体的合法性与多样性,还牵涉到城乡之间、专业性与在地性之间的话语权重分配。其二,“如何讲述乡村”的问题。其强调叙事内容与表达方式的选择,包含着传统与现代、审美与功能之间的张力。其三,“为谁讲述乡村”的问题。其重在回应传播机制与受众定位的重要性,关系到乡村叙事是否能够真正实现公共性与共享性的问题。

上述三重关切不仅是艺术实践的现实困境,更深嵌于城乡结构性差异、文化产业要素配置失衡以及国家治理逻辑变革的复合关系之中。因此,乡村叙事话语的建构不能仅停留在经验总结层面,而应从实践中抽象出具有批判性、系统性与开放性的理论框架。在这一进程中,理论的角色不仅是对既有

经验的概括与提升,更应成为未来实践的方向引导与规范参照。只有在扎根于本土实践的基础上建构出可持续、可迁移、可批判的理论模型,艺术乡建才能真正实现对乡村文化的持续激活和社会共识的重构,从而回应乡村振兴背景下“文化重建”的时代命题。

2. 主体位置的转换:重构文化表达的权力结构

中国乡村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长期处于中心话语体系的边缘,其文化表达在宏大叙事中常被简化为“发展落后”的象征性他者。城市中心主义的视角使乡村被建构为需要改造与拯救的对象,而非具有自洽文化逻辑与主体意识的生活空间。在这种语境下,乡村往往被动接受来自城市或主流社会的叙述,而缺乏自我表达的空间与权力。艺术乡建作为一种跨界实践介入,为乡村重新进入当代公共视野提供了契机,尤其是在文化再生产和地方认同重建中展现出独特价值。然而,如果艺术介入仍延续原有城市文化主导结构,仅作为城市经验的延伸或再包装,那么其结果可能只是“他者再现”的另一种形式,难以真正触及乡村文化主体性的觉醒与建构。

在大量艺术乡建实践中,外来艺术家主导的策展逻辑普遍占据主导地位,村民往往被置于被动接受的位置。这种权力结构体现在多个方面:一是“被观看”,即乡村空间和村民生活被艺术化地呈现为供外界欣赏的视觉图景;二是“被解释”,即村民的生活经验往往被艺术家套用现成话语加以阐释,其在地知识的复杂性与自主性常被忽视;三是“被命名”,即艺术项目常以外部命名方式建构地方形象,使村民无法参与对自身文化意义的界定。这三重他者化机制固化了艺术与乡村之间的权力不对称,使得“艺术乡建”在实践上很难摆脱“文化殖民”的质疑。

尽管部分项目开始尝试通过“共创”“协作”“参与式策划”等策略引入村民角色,但其操作层面往往局限于村民的表面参与,未能真正打破艺术主导与村民被动之间的结构性壁垒。因此,实现乡村叙事主体性的重塑,必须从理论与机制两个维度入手,回应皮埃尔·布迪厄关于文化资本与象征权力的经典论述。布迪厄指出,文化场域中不同主体在象征权力的分配上处于不平等状态,这种不平等通过话语、制度与习惯不断得到再生产。将这一视角引入艺术乡建实践,意味着必须从“代表村民说话”转向“赋权村民自述”,也就是说,要改变既有的文化中介模式,使在地主体能够真正拥有叙事的主动权与

解释权。

实践层面上,这一理论主张需要通过制度化机制予以落实。例如,艺术乡建项目在策划与实施阶段应构建“在地主导—外来辅助”的权力结构,将村民置于话语建构与项目决策的核心位置;不仅要赋予社区居民充分的参与权,更要保障其具有实质性的话语影响力。唯有如此,艺术乡建才能跳出“乡村展演”的逻辑套路,转而推动一种基于平等协商、文化互认的合作模式,从而实现从“城市绘乡”向“乡村自叙”的根本性转型。该转型不仅关系到艺术实践的伦理边界,更是对乡村文化尊严与社会公正的基本回应。

3. 在地文化的重释:构建叙事结构的文化转译机制

中国乡村拥有绵延不断的历史传承与多样性的文化母体,其中涵盖了宗族伦理、生产习俗、仪式行为、“非遗”技艺等丰富内容,构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生态系统。这些文化资源虽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与社会根基,却并不天然地具备现代意义上的叙事能力。也就是说,在当下的媒介传播语境与审美逻辑中,如何将这些乡土文化要素有效转化为具有组织结构、可感知形式与传播可能的话语内容,是推动乡村叙事理论建构的核心任务。这不仅是一个技术层面的转化问题,更是关系到文化再生产机制与意义生成逻辑的根本性议题。

回顾国际经验,许多国家在乡村文化转译方面已形成较为成熟的机制。例如,欧美一些国家通过社区剧场、地方节庆活动以及对民间记忆的重构等方式,激发本地居民对自身文化的认同与参与,在演绎中实现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统一。以英国的社区戏剧为例,艺术家与居民共同编排剧目,将地方历史、人物和传说融入表演,既达到了文化传播的目的,也强化了社区凝聚力。再如法国的地方节庆,通过仪式性集体行动将乡村文化视觉化、节奏化,从而增强其传播效果与公共影响力。相较而言,日本在乡村文化叙事方面尤为注重“地域资源”的再发现与再诠释,大地艺术祭便是典型案例。其通过艺术装置与自然景观、乡土遗产的深度结合,不仅实现了审美重构,还为乡村空间带来了文化激活与旅游流量,形成一种具有延展性的“叙事场域”。

在中国当前的艺术乡建实践中,部分艺术乡建团队已开始意识到文化要素在叙事结构中的重要性,尝试将宗族记忆、“非遗”技艺、村落仪式等文化母题加以现代转译。例如,有项目通过影像记录与

数字影像装置呈现村落的历史故事,有项目将民俗表演嵌入乡建节庆活动,还有项目通过互动媒体技术构建沉浸式乡土体验场景。这些尝试无疑拓宽了乡村文化传播的路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由于缺乏系统性理论支持,许多项目在内容选择与表达方式上仍显随意,文化元素的转译多停留于表面形式的挪用与符号层级的消费,难以实现深层次的文化激活与内涵表达。另一方面,在地文化的解释权与主导权未能有效建立,导致许多项目由外来团队主导,村民与地方性知识常被边缘化,乡村叙事权力依然失衡。

因此,从理论层面出发,亟须引入文化研究中的符号转译理论框架,将乡村文化视作一个持续生成的活态系统。该框架强调在转译过程中实现文化语境、受众理解与传播效果三者之间的动态协商和平衡。具体而言,应通过“语义还原”将文化元素放回其本然的历史与社会语境之中,避免文化元素运用的误读与错位;通过“图像嵌套”将文化符号融入新的视觉表达形式,增强文化标识的识别度与传播力;通过“叙事再编码”将零散的文化内容整合为具有逻辑性与结构性的话语系统,使其在当代社会中具备较强的讲述力、感召力与传播力。唯有如此,乡村叙事才能真正实现从文化素材到话语体系的内生性转化,构建出具有学理支撑与社会影响的乡村文化表达路径。

4. 传播形态的革新:媒介融合中的表达策略建构

随着数字媒介技术的迅猛发展,当代乡村叙事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表达方式变革。从过去依赖口述传统、文字记录和实地展演的线性模式,逐步过渡到以影像化、平台化和互动化为特征的复合传播形式。在艺术乡建的多样化实践中,视频短片、线上展览、数字地图、沉浸式体验装置等新型媒介手段的应用,已成为呈现与传播乡村文化内容的重要工具。这些技术不仅拓宽了艺术表达的边界,也增强了乡村叙事在更广泛社会空间中的可见性与传播力,为理论建构提供了媒介融合的新路径。

然而,媒介融合所带来的并不只是表达维度的拓展,也伴随着诸多潜在问题,特别是存在技术主导下的叙事失重倾向。在数字传播逻辑的驱动下,乡村文化内容往往面临“可视化优先”的筛选机制,即以图像吸引力、视觉冲击力为主要标准进行内容再构。这种机制容易导致原有文化的多义性与在地语境被简化或异化,从而使乡村叙事陷入“景观化消

费”的陷阱。乡村被重构为视觉奇观或审美对象,而其复杂的社会关系与文化内涵则被有意或无意地遮蔽,削弱了叙事的批判性与文化主体性。

因此,从理论角度出发,有必要引入麦克卢汉的媒介决定论以及传播生态学的相关观点,对当前的乡村叙事实践进行深层解析。麦克卢汉指出,“媒介即讯息”,强调媒介形态在信息传达中具有决定性作用^[25]。这一观点提醒我们,媒介并非中性的传播通道,而是深刻影响着内容的呈现方式与接受路径。而传播生态学则主张从系统角度看待传播行为,关注媒介、内容与受众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这意味着,在艺术乡建项目中,媒介不应成为叙事的主导力量,而应回归为内容表达的服务机制,参与构建“内容—媒介—接收者”三者之间的有机联动关系。唯有如此,才能避免叙事内容沦为技术展示的附庸,保障文化表达的本体价值。

此外,还须在实践层面推进媒介逻辑与乡村逻辑的深度融合,探索技术手段与在地文化共构的可能路径。例如,通过短视频记录乡村劳作日常与民俗活动,呈现乡土生活的真实质感与劳动美学;利用互动装置模拟传统节庆现场氛围,增强观众的沉浸体验与情感连接;借助虚拟现实技术重构宗族谱系、历史空间等,使其在数字媒介中焕发新的叙事生命力。这些实践不仅提升了乡村文化的传播效能,而且强化了其内在文化张力,使数字传播过程成为文化意义的再生产,而非内容消费的终点,真正实现媒介手段与文化表达的双向赋能。

5. 制度支撑的构建:话语体系可持续运行的社会机制

乡村叙事话语的构建不仅是文化表达的问题,还是制度安排与社会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实践层面来看,当前中国艺术乡建多数项目普遍采用项目制运作模式,即依赖短期资金投入和阶段性任务驱动进行内容生产。这种模式虽然具备一定的灵活性和实验性,但由于缺乏稳定的组织架构与持续性的制度保障,往往难以形成具有内生更新能力和系统建设逻辑的话语体系。一旦项目结束,相关机制便随之解体,原本初具雏形的乡村叙事话语也随之中断,导致成果无法有效积累,影响整体的文化持续性与社会效应。

以浙江模式为例,其在艺术乡建中之所以能够体现出相对成熟的制度优势,就在于该模式注重将艺术生产纳入地方治理结构,构建由省级文化部门主导、地方政府协同、专业团队执行的多层次协作体

系。这种“行政引导—项目嵌入—在地协同”的模式,不仅保障了政策与资源的持续投入,也在制度层面为话语构建提供了连贯性支持。同时,浙江省各地在平台建设、机制设计与人才引进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艺术乡建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这种多方联动的体制安排,为乡村叙事话语的持续更新与传播创造了稳定的基础。

从理论视角出发,艺术乡建要实现真正的话语建构与社会影响力,必须在国家文化治理体系中确立“艺术—社会—政策”三元互动的的基本结构。这意味着艺术介入不仅要具备政策合法性,更应嵌入社会关系网络,形成文化表达的公共基础。政府角色应由“内容干预者”转向“结构赋能者”,以制度创新引导多元主体的深度参与。具体而言,应鼓励各地根据自身资源禀赋与文化传统,建立具备长期性与可持续性的文化平台,如“村级艺术空间”“乡村策展团队”“居民文化自组织”等。通过制度保障这些平台的运行与演进,推动地方文化从“被动展演”走向“主动生成”。

此外,为确保乡村叙事话语体系的科学发展和有效传播,还需建立一套多维度、可反馈的话语评估机制。该机制应涵盖“在地满意度”“文化再生产能力”“外部传播力”三个核心维度,形成从村民认同到外部接受的完整闭环。只有在制度支持下实现内容生产的常态化、话语建构的规范化与传播机制的多样化,艺术乡建才能摆脱单向度的城市文化输出逻辑,实现乡村文化的多中心生成与动态繁荣。

6. 通向多元主体与动态表达的叙事未来

中国艺术乡建的叙事话语建构正处于从实践探索向理论建模转变的关键阶段。未来,艺术乡建应在“赋权—协作—生成”的发展逻辑中,适时建构可持续、可批判、可协商的乡村叙事话语体系。通过媒介融合提升表达能力,通过制度设计保障文化积累,通过在地激活实现社会认同,乡村逐渐发展成为“能自我叙述的文化共同体”。

概言之,通过国际比较与本土创新相结合,艺术乡建有望成为新时代中国乡村叙事话语构建的重要平台和抓手^[26],不仅有助于提升乡村文化软实力,还将推动乡村社会的全面振兴与现代转型,开启乡村可持续发展的新篇章。

结 论

在全球乡村振兴与可持续发展语境中,艺术乡

建作为一种具有较强创新性的乡村建设路径,正日益展现出其独特的社会与文化价值。国际案例显示,欧洲、日本、加拿大等地区和国家通过多样化的艺术乡建实践,能够有效激发乡村社区的内生动力,促进乡村经济、文化、社会与生态的多维复兴。这些国家在实践中普遍重视艺术介入与乡村原生文化的有机结合,推动了地方认同感的重塑以及乡村生活方式的创新发展,为全球乡村振兴事业提供了重要经验借鉴。如欧洲国家以艺术节、公共艺术项目及文化遗产保护行动为支点,积极增强农村社区凝聚力,提升乡村地区的外部知名度与内部活力,同时促进了农业以外的其他产业的协同发展,推动了乡村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日本则通过将当代艺术深度嵌入乡村环境,探索出以文化复兴带动经济振兴的成功路径,充分证明了艺术介入乡村空间治理的价值潜力。加拿大在乡村艺术建设中注重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表达的双向结合,强调社区主体性的发挥与文化认同的再生产,在维护乡村文化连续性的同时,增强了乡村社区的未来发展能力。总体来看,国际艺术乡建实践虽然因地制宜、路径多样,但都在努力实现保护与发展并重、创新与传统并行、文化认同与经济增长共促的总体目标。这种综合性发展思路也为中国乡村振兴背景下艺术乡建的话语体系建构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参考。

在国内背景下,中国艺术乡建虽起步较晚,但发展迅猛。各地在政策引导、资源配置与实践探索等方面不断深化,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乡建模式。在此过程中,浙江省作为典型代表,以其先行先试的探索实践,对全国范围内艺术乡建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浙江省在推进艺术乡建时,不仅注重乡村基础设施与物质条件的提升,更强调文化艺术的内涵式介入,力图通过文化塑造重构乡村的社会结构与价值认同。

浙江模式的探索表明,艺术乡建在中国不仅是文化环境的改善工程,更是促进乡村多维振兴的重要引擎,有效实现了文化自信与乡村现代化发展的双向驱动,探索出一条非营利性文化建设与营利性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可持续路径。此外,浙江省在艺术乡建过程中对产业振兴、人才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等方面的协同推进,体现了新时代乡村建设的系统性思维,为全国其他地区提供了有益参考。然而,在总结浙江经验的同时,也须避免简单套用或过度依赖单一区域经验的误区。中国幅员辽阔、区域文化多样,艺术乡建实践必须立足于各地独特的

文化基因与社会实际,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在构建中国乡村叙事话语体系过程中,应当注重多样性与包容性,既要借鉴国际成功经验,又要充分尊重本土乡村的历史积淀与文化特质,真正实现从乡村内部生长出叙事逻辑与文化表达。一方面,应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吸纳国际艺术乡建的理念与方法,学习如何通过艺术介入实现乡村空间、社会和文化的协同再造;另一方面,应深耕本土丰富的文化资源,强化地方性知识体系的建构与传播,通过艺术语言讲述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精神与国际传播力的乡村故事。

同时,还须认识到,艺术乡建的话语构建不仅仅是乡村内部的文化表达问题,更关乎国家形象、社会发展理念乃至文化软实力的全球呈现。因此,中国乡村叙事应致力于打破传统城乡二元对立思维,展现新时代乡村在社会创新、生态文明建设以及文化复兴等方面的积极面貌,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塑造更具活力与创造力的中国乡村形象。只有持续推动本土化与国际化相结合,坚持传统与创新并重,协同推进文化振兴与经济社会发展,才能在全球乡村振兴的大潮中讲好中国乡村故事,树立起富有中国特色与世界意义的乡村文化新标杆。

注释

①截至目前,“艺术乡建”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概念,关于“艺术乡建”的定义、内容、发展方向及其实现机制、理论逻辑和行动目标等学界探究,尚未形成共识。例如,“艺术乡建”表述也存在“文化乡建”“创意乡建”“文化乡村”等各种关联称谓。理论研究层面,艺术学、人类学、社会学、建筑学等学科均参与探讨。本文案例之所以突出浙江,一是因为浙江打造了艺术乡建“省域典范”;二是因为作者在浙江有超过10年的田野调研经验,熟悉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变迁。②近20年来,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显著。“十三五”期间,浙江省GDP总量突破6万亿元,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至2020年年底,浙江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7565元人民币,连续38年居全国省级首位,仅次于直辖市上海。在2023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4万元,连续39年在各省区中位列第一;城乡间居民收入倍差自2012年的2.37降至2023年的1.86。与经济增长相伴,浙江省同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改善与精神文明建设,累计建成美丽乡村示范县45个、示范乡镇500个、特色精品村1500个。这一宏观背景为艺术介入乡建提供了坚实的经济与社会基础。

参考文献

- [1]李敢.社区总体营造视野下乡村活力的维系与提升:基于新旧“莫干乡村改进实践”的案例比较[J].城市规划,2017(12):90-96.
- [2]张抗抗,范骏,李旭.“艺术乡建”理论与实践[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3(2):11-16.
- [3]张颖.中国艺术乡建二十年:本土化问题与方法论困境[J].民族艺术,2021(5):15-25..
- [4]严俊,许北辰.艺术乡建:基于“利益-规范”双重目标的群体互动

- 分析[J].社会学评论,2023(2):212-236.
- [5] DUXBURY, CAMPBELL. Developing and revitalizing rural communities through arts and culture[J]. Small Cities, 2011(1):13-26.
- [6] CRAWSHAW, GKARTZIOS. Getting to know the island: Artistic experiments in rural community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6(3): 134-144.
- [7] TOWNSEND, WALLACE, FAIRHURST. Broadband and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in rural scotland[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7(5): 451-458.
- [8] 陆梓欣,齐骥.艺术乡建与乡村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J].理论月刊,2022(6):83-91.
- [9] 张彝.论艺术乡建的本质与要义[J].民族艺术研究,2022(6):13-22.
- [10] 向丽.怀旧·乡愁·乌托邦:中国艺术乡建的三重面向[J].民族艺术,2021(3):11-19.
- [11] 刘琪.艺术参与乡村建设的审视与思考:以乡村文化振兴为视角[J].社会科学家,2022(9):142-148
- [12] 肖昕,涂紫姝,冯菁.艺术乡建助力乡村文化振兴探析[J].民族艺术研究,2023(2):154-160.
- [13] 方李莉,范晓颖.中国艺术乡建的理论与实践[J].美术,2023(7):21-29.
- [14] 张颖.隔岸观“我”:中日艺术乡建的田野考察反思[J].民族艺术,2022(5):34-41.
- [15] GRENNI, SARA, HORLINGS, SOINI. Linking spatial planning and place branding strategies through cultural narratives in places[J].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2020(7): 1355-1374.
- [16] GRAVES. Cultural democracy: The arts, community, and the public purpose[M]. Springfield: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10:9-11.
- [17] 斯米杰斯卡,孙雨嫣,杜鎔勋.变革与复兴:1989年后波兰批判性艺术与乡村社区文化振兴[J].民族艺术,2020(3):29-37.
- [18] 孟凡行,康泽楠.从介入到融和:艺术乡建的路径探索[J].中国图书评论,2020(9):8-23.
- [19] 李耕,冯莎,张晖.艺术参与乡村建设的人类学前沿观察:中国艺术人类学前沿话题三人谈之十二[J].民族艺术,2018(3):8.
- [20] 陈炯.艺术振兴乡村的策略与方法研究[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1(2):163-172.
- [21] 徐晓慧.人类学视域下乡村振兴的审美逻辑与艺术实践[J].广西民族研究,2021(6):100-108.
- [22] 张浩.从“民族自觉”到“文化自觉”:费孝通“文化自觉”概念探源[J].文史哲,2025(2):113-125.
- [23] 费孝通.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2.
- [24] 陈宁宁.大变局视域下的费孝通西方文化观研究[D].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2024:2.
- [25] 范龙.“媒介即讯息”:麦克卢汉对媒介本质的现象学直观[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2):189-195.
- [26] 温铁军.中国艺术乡建[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21:2.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Rural Narrative Discour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Art Rural Construction

Li Gan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narrative discours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th to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rural society.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models for promoting rural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the art rural construction can inject new momentum into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by enriching the supply of rural culture,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and enhancing cultural soft power. Starting from an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nalyzing the practical paths and situational adaptability of art rural construction in different countries can reveal the specific mechanism of art intervention in reshaping rural ident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research on art rural construction from an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s not only beneficial for deepening the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of art empower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but also provides useful references for policy optimization and practical innovation in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At present, the uniqueness and commonality of Chinese art rural construction practices in the global context provide a new analytical dimension for the theoretical expans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narrative discourse.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art townships not only enriches rural connotations through cultural expression, but also demonstrates unique value in building modern, livable, and spiritually vibrant rural communities. This active explor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China and guiding rural construction practices.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art rural constructio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rural narrative discourse

责任编辑:翊 明